



上海还有不少老小区。

出现突发情况，居委会抗压能力很脆弱。

针对深圳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差异化原因，《新民周刊》记者采访了上海政法学院政治管理学章友德教授。章教授梳理了两个关键点：历史传统和人口构成。毕竟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水土不同，人的生活方式不同。

首先，深圳和上海社区治理的历史传统不同。

深圳是一个在市场化改革中生长出来的城市，在诞生之初，就没有经历过计划体制时代。刚开始进行社区治理时，深圳体制内的公务员双休日需要到社区做义工，参加社区义务劳动，称之为义工制度。

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深圳义工服务出现缺口。深圳开始不断探索社区治理模式，曾向香港学习引进社工服务，也曾到上海学习社区治理经验。最后，深圳选择推进建设社区工作站，由政府出钱，为基层社区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。

而上海，在开埠以后，华洋汇集，五方杂处，在解放前早就形成了上只角、下只角，以及高档洋房别墅区，新式里弄、公寓住宅区，普通石库门里弄、绞圈房子、滚地龙棚户区等，整个城市社会结构相当复杂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上海部分新村经历了单位制度，小区居民也多多少少有同行、同事关系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单位制解体，上海在不断地适应经济结构变化，社会结构转型。从最初的市区二级政府，到探索出街道三级管理，再到后来增加的居委会四级网络，一步一步地把完全由政府控

制的资源慢慢地往基层社区转移。

其次，深圳和上海的城市人口构成差别较大。

深圳是改革开放这40年才形成的一个超大型城市，年轻人在深圳的人口总量中间占了大部分比重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，但有近四分之三的深圳市常住人口都没有本地户口。如何管理好具有强流动性的常住人口，并让他们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来？深圳市采取了政府外聘社区工作者的方式，既为年轻人提供了就业岗位，也为社区提供了专业化社会服务。

上海的人口构成很多元。现在上海有2500万常住人口，其中有各个历史时期移民上海者的后代，还有一部分是乡镇拆迁搬进社区的，还有新上海人，又是新一轮的五方杂处。上海还有一些涉及外国人居住的国际社区，在他们的意识里，好多欧美国家完全是自治型的社区，本身就没有居委会这样一个组织，如何让外国人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，是需要居委会考虑的问题。

上海还有不少老旧小区和老龄化社区。比如黄浦区，有些建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尤其像五里桥街道、外滩街道、南京东路街道等，有许多老弄堂。普陀区曹杨新村一些老房子之前是工人宿舍，老旧的房屋和落后的设施已经适应不了当前居民的需求。年轻人到别处买房居住，老人留守社区，老龄化程度在逐年增高。社区人员层级丰富，社区新旧程度不同，上海的居委会往往需要解决复杂多样的社区问题。这让本就人力紧张的居委会一直奔波在紧张工作的道路上。至于社区服务，则是居民推一段走一段。

当然，为了给居委会减负，上海近些年也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比如完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职能、推动“一网通办”普及、推动社工站建设，计划在2025年底前全市建成千家社工站等。

章友德认为，社区治理最基本的要义是共治共享。没有了“共”也就没有了不同于传统社会管控治理的模式。如何更好地协调政府机构和居民实现共享共治，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复杂议题，需要一代代人跟随时代的步伐，不断反思实践，不断改革创新。